

引马迁

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洁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司马迁

【散文选集】

陈晓芬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马迁散文选集 / (西汉)司马迁著;陈晓芬编.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散文丛书)
ISBN 7-5306-1764-8

I. 司... II. ①司... ②陈...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西汉时代 IV. I26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29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08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9.80 元

司马迁和他的散文

陈晓芬

《史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骄傲。这部巨著凝聚了历史的冷峻和创作主体的热情，具有摄人心目、撼人情志的文学效应，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者，从中感受到司马迁的人格精神和思想光彩，汲取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悠悠两千余年，《史记》魅力不减，直至今日，它仍然给我们难以尽言的多种启迪。这样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我们是无法漠然视之的。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人，其生卒年说法不一，据王国维考证，生年约是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卒于武帝末年（前87）左右。

司马迁自小习诵古文，在文史方面有深厚修养。二十岁时曾漫游东南诸地，观瞻历史古迹，了解了许多民俗风情。其后入仕郎中，这虽然是一个小官，却随侍皇帝左

右,使司马迁对宫廷生活有直接的接触,同时因常有侍从皇帝出游的机会,对社会生活也有更广泛的了解。这期间,司马迁还曾奉使到西南巴蜀等地去视察抚慰。这些经历为司马迁日后的撰史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父职任太史令,他利用职务之便,广泛阅读并整理宫中藏书,着手于著史的准备工作的。公元前104年,在主持完成太初历的改历工作后,正式开始撰写《史记》。公元前98年,在《史记》草创未就的关键时候,司马迁由于为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一事辩护遭受官刑。这种酷刑不仅使他身体残缺,而且给他留下心灵的耻辱,但为了著史事业,司马迁以坚毅的意志忍受了肉体和精神巨大痛苦,终于在公元前93年前后,基本完成《史记》的著述。此后,司马迁的事迹就难以考求。

《史记》记事始于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馀言。这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无论在史学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从司马迁的主观认识看,他所进行的完全是史学范畴的工作,在他的著书宗旨中并不含有文学方面的意想。然而《史记》却取得了巨大的文学成就,《史记》所具备的许多文学特征,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发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现象提示我们,要真正认识《史记》的文学价值,要从文学角度对《史记》作深入的考察和探析,是不能脱离司马迁的著史本意而孤立进行的。

司马迁志于著史,不是简单的职责意识使然。在《太史公自序》中,他郑重追叙“世典周史”的祖业,深情记叙

父亲临终前的嘱托：“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并详细记录了他与壶遂关于著史问题的严肃讨论，这一切旨在说明，司马迁之写史，是彰明汉朝大业的需要，是继承祖业的需要，也是个人立身扬名的需要，他内心所承负的是神圣而又沉重的责任感。这一责任感又具体转化为“成一家之言”的强烈愿望，贯穿在他写史的全过程中。当司马迁受官刑之后，他敏锐地体味着自己在众人眼中的卑贱身份，对他来说，任何实现自我价值的出路都已断绝，他没有选择的余地，立身扬名的心志，被挤逼到著史这唯一的工作中。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列举孔子、屈原等人以自励，指出他们都是“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同样，他也不得不把对人生的全部理想唯一倾注在著史的事业中。所以，他不会满足于汇录史事，甚至不会满足于一般地达到真实而不溢美溢恶，尽管历史上有不少史官只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就付出很高的代价。司马迁所需要的是在实录的前提下，充分传示他的“一家之言”，他不是历史的记录员，他是怀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来面对历史的。这决定他必然按照自己的思想个性来择取史事、确定体裁以及采用具体的表现手段。可以这么说，在一定程度上，《史记》所具有的许多文学特征，实质上是司马迁对历史、哲学、社会等诸种问题的认识总和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折射。

司马迁深刻认识到，促使历史发展变化的根本因素是人，当然，他主要指属于统治阶层的君主臣吏，他说：

“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乐书》）又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表述，说明司马迁对人事问题的感受十分强烈，因此，他要写历代的兴衰，就不可能离开君臣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为人行事的情况。司马迁对史事的注意重心落在人上，既是出于他自己的感受，也是对传统治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转述孔子著《春秋》的用意时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这一观点指示了著史方向，当历史要成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要成为现实的借鉴和对照时，它就不会是死的资料，它不因为是过去发生的事而显出凝固的形态，它应该是动态的、有声有色的。孔子赋予历史的生命力体现在精微的文字变化上，形成了“以一字为褒贬”的“春秋笔法”；而司马迁怀着与孔子相同的著史目的，则把注意重心完全落在错综复杂的人事现象自身的再现上。梁启超曾说，关于历史是由环境构成还是人物构成的问题，“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中国史家，最注意于此，而实自太史公发之。”（《要籍解论及其读法》）此言的是确论。《史记》把人物传记作为全书主体，形成以人物为中心的基本构架，就是司马迁的历史观在表现方式上的一种反映，或者说，是他对历史的认识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而以人物为主体，恰恰是迈向文学的第一步，因为这是历史和文学可能相通的一个重要的共点。高尔基在区别艺术与历史的不同表现特征时

指出,前者是以“活材料和人为对象的工作”,后者是“以书籍和文献为对象的工作”(《维诺格拉多夫的〈时代的三色〉一书序》)。而司马迁所写的对象正是人——当然,这是历史人物,与文学艺术作品中虚构的人有本质区别。但是这些历史人物同样起着以感性形象来体现理念的作用,同样给人们提供了直接的观照对象,也就是说,他们具备了某种程度的文学性能。而在不违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许多文学手段也只有的人物这一载体上才可能得到充分实施。《史记》之前的《左传》、《战国策》、《国语》诸书,各以情节、语言等特点在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究其根本,这些长处的体现终是落在人物身上。司马迁以更自觉的意识把记叙重点转向人物,是《史记》获得更高文学地位的基本前提。

以人物为中心的原则与“一家之言”这一意念的结合,造就了《史记》一系列重要的文学特征。

首先,司马迁在记叙一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时,充分表现了他们的性格特征。这些人物的作为,不仅是一代历史的构成,而且是他们自我心灵的袒示,在他们身上,呈现出缤纷的个性色彩,这使得《史记》中的人物具备了文学形象的基本特性。司马迁注重表现人物个性,是因为他考察变动的历史现象,意在探究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从而融入他本人的思索和见解。就像他在说明“本纪”的创作宗旨时所云,他要论叙“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自序》),这其实也是《史记》全书的本旨。书中各种体例的内容重点和表现方式固有不同,但目的大抵可归本于此。当司马迁把这一探究落实到一个个具体

的人身上，不能不注意到个人性格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就像他在《魏其武安侯列传》论赞中分析窦婴与灌夫的不幸结局时所指出的，窦婴“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他们性格上的弱点，是“祸所从来矣”。性格既影响着人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当他具有某种权势时，也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马克思指出，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致路·库格曼》）不管司马迁的认识是否自觉达到这个高度，他在实际的记叙中却形象地表现了这一点。

在《孙子吴起列传》和《李斯列传》两文中，司马迁清晰地显示了吴起和李斯两个人物的性格与人生行为的联系。他们有相似的经历，都从社会下层进入最高统治集团；他们又有相似的追求，都热衷并贪恋地位声望。但是他们存在着性格差别，因而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两人行为方式也不尽相同。吴起在目标追求的过程中表现出坚毅、狂烈的特性。他年轻时因游仕不遂导致家境败落，遭到乡人嘲笑，这一精神刺激，使他具有为达到目的宁可丧失其他一切的偏激性，也使他产生不能为人所制的傲气，他杀妻辞母，为士卒吮疽，这些行为都透露出心中沉重的压力和喷涌欲出的期盼。吴起辗转数国之所为，以及在楚国实施的一系列强硬措施，无不显露着性格的印痕。而李斯的追求则更多理智的权衡，也包含更多世俗的实利之想，因此他在需要作出抉择时，不像吴起那样冲动、愤激，而是瞻前顾后，反复思虑。他在谋得高位后，就常

常停留在对现状的体验中,担忧失去这一切。就是这种保守性和软弱性,使他终于卷入赵高的阴谋之中。在吴起和李斯这两个形象中,我们看到了封建士吏的共性,也看到了他们不同的个性。人物各各相异的个性风采,正是来自于司马迁对他们行为、动机的深入探究。

张良也是司马迁在探寻人物历史足迹过程中所塑造的一个很有性格的形象。《留侯世家》一开始就记叙了张良企图刺杀秦始皇的事件,这与张良的出身有密切关系。父祖辈“五世相韩”的经历,决定了他当然地把自己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决定他不可能是个冷漠世事的人。同时,这一举动也反映出张良急躁而缺乏忍耐性的特点。张良遇见圯上老人,是他性格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从文中可以看出,老人指引于张良的属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在性情上应是忍耐和宽容。于是,在张良以后的经历中,两种不同的人生行为成为奇妙的组合反映在他的身上。他为刘邦筹划了许多谋略,如撤消复立六国的决定、笼络韩信、封雍为侯以安人心等等,这些计策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顺应世人贪权欲利的心态,以荣名实利为本,来诱惑或利用对方。这些计策的成功,说明张良对世人功利之想的把握非常准确;而只有对这一欲念有过切身体验的人才可能这样深刻了解它,也只有真正超越这一欲念的人,才可能这么透彻地剖析它并冷静地利用它。张良一面牢牢掌握着这个筹码,使诸人纷纷落入彀中,一面却清醒地与之保持距离。文中多次写及张良辞却厚封、杜门不出、欲弃人间事等情况,不能不使人意味到他定计时的睥睨世俗之心。司马迁以生动的叙写,说明张良能够

成功,就因为摆脱了年轻时与功利相关的急躁和轻率,就在于他身处名利场而心无所动。尽管文章以主要篇幅记述张良出谋划策的内容,但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谋士的智慧,更感受到了这个形象特有的风神。

对人物成败原因的深刻思索,还使司马迁笔下涌现出一批性格表现比较复杂的人物,这些形象更富有立体感。项羽即是其中出色的一个。在《项羽本纪》的论赞中,司马迁一方面惊叹项羽兴起的猛烈,另一方面也清醒地指出他“自矜功伐”、“欲以力征经营天下”的错误。这一理智的褒贬体现在具体的人物描写中时,显示出的性格形态远比论断要丰富得多。如在鸿门宴这一段,项羽显得仁慈、犹豫,结果错失杀掉刘邦的机会,为自己留下无穷的祸患,这与他斩宋义时的果断、坑秦卒时的凶暴形成极大反差。作者在叙写中揭示了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性格原因,从刘邦的恭谦有礼、唯唯陪罪以及项羽入席时自居尊位等情状中,可以看到项羽当时强烈体验到了高居众人之上的威严,他充满了精神上的优势感,陶醉在心理满足中。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合,项羽身上的所谓“妇人之仁”充分表现出来,而从本质上看,这与他的果敢、凶暴,皆出自“自矜功伐”这一狭隘的个性,它们是源于同一性格内核的不同外观形态而已。项羽这一形象之所以备受后人称叹,主要原因就是司马迁写出了项羽个性既矛盾又统一的复杂形态。

也许是出于诚意劝谏却反遭刑祸的惨痛教训,司马迁对于一些既能陈述己见又能达到目的的人物存有一份特殊的心情。他完全懂得,要使皇帝接受劝谏,往往不是

靠忠心奏效,更需要审时度势,以委婉的方式投君王之所好。历史中不乏这样处事的人物,如汉初著名丞相陈平、文景时的名臣袁盎等,皆有这样的特点。司马迁在记叙中并没有对他们简单地断以褒贬,他固然热情赞美不顾个人安危刚直敢言之士,但他的内心深处也未必不潜藏着对那些能持守大道、也能保护自身安全之士的歆羡,这实质上是对成功的向往,也蕴含着某种痛苦的反思。因此,《史记》中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群中也包括了这一类形象。如司马迁写袁盎所选用的每个事例,几乎都能反映出袁盎性格的多重性。在文帝处理淮南王一事中,事态的发展尽被袁盎言中,但他丝毫未露骄矜之色,没有用片言只字显示自己预见的正确,却一味为文帝开脱。司马迁的叙写令人感到这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阿谀献媚,因为淮南王之死是文帝维护国家利益的正当行为中出现的一个小过失,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因为这个疏漏而抵消文帝的功业,却更需要尽可能采取措施弥补这一过失,袁盎的劝辞正是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他一意维护君王威信的言辞自然也讨得了文帝的欢心,他顺理成章所提出的建议又博取了诸侯王及朝臣们的信服。同样,司马迁也客观公允地记述了袁盎谏赵同陪乘事、进言申屠嘉及对待吴国叛乱诸事,这些事例让人处处感到,袁盎身上集合了正直、仁慈、善于察言观色、世故等多种特性,这实在是个很难一言以蔽之的形象。

总之,《史记》中的人物行为不是作为孤立的表象被记叙下来,它们与人物性格密切相关,因此既具备社会性,又有鲜明的个体性,这样,人们不仅从中读到了史事,

也看到了一个个富有生命力的形象。

其次，司马迁在叙写历史人物的事迹时，着意于悲剧气氛的渲染。这些人物的经历和遭遇是经过作者感情浸润的产物，因而总是以尖锐的冲突形式带给人们沉重的思索。司马迁在努力从人物主观性格行为中发掘影响成败的因素时，也深深感到，生活中存在着一种非个人意志所能抵御的外部力量，迫使人趋向于某一个终极。他感慨东周王庭衰微的情状时说：“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若也。”（《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这说明，道德不是王业兴衰的唯一依据，道德也不能给个人以命运的保证。司马迁自身的经历，更使这一来自于历史的认识有了感性体验。他在文中不止一次叹息道：“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范睢蔡泽列传》）“变所从来，亦多故矣。”（《郑世家》）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更发出悲怆的呼喊：“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感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样的人生悲剧意识倾注于历史人物的记叙中，必然凝聚成浓重的感情色彩，使作品产生出巨大的文学震撼力。这是《史记》另一个显著的文学特征。

历史上有不少品格高尚、功业显赫但结局悲惨的人物，他们的人生历程自身即构成了一出完整的悲剧。在这类传记中，司马迁以典型事例的强烈对比，艺术地强化历史本身拥有的悲剧意味，从而宣泄心中的不平。如《魏公子列传》，魏无忌的人生悲剧是在他的品德才华与病酒

而卒这一结局形成的反差中突现出来的。为了加强两者的对比效果，司马迁对无忌的形象作了多角度的叙写。他以细腻的笔触直接描绘无忌迎接侯嬴的全过程，又以平原君的浅薄衬托无忌求士的真诚，甚至用虚饰之语夸张性地声称，因无忌的缘故，诸侯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据《魏世家》，魏安釐王即位后十馀年，秦、赵等国攻魏的战事时有发生，故郭嵩焘《史记札记》云：“所谓‘诸侯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是史公极意描写之笔，无事实也。”不仅如此，在文章的结尾，司马迁把秦国大举攻占魏城的军事行动紧接在“秦闾公子死”之后，有意通过文字的组合造成一种印象，即魏的最后灭亡与无忌的毁废而死有关；但是在《魏世家》中，司马迁却理智地指出：“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可见，司马迁在《魏公子列传》中的表现方式更多地受到主观感情的支配，正因为极意突出无忌的不凡，他的结局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激起人们的痛惜之情。

而在《李将军列传》中，为了加强李广英勇善战却未得封赏、最后自刎身亡这一遭遇的悲剧色彩，司马迁对文中战例作了精心选择。凡重点叙写的战斗，几乎都出现旁人难以应付的困难局面，李广不仅一次次从困境中脱身出来，而且给匈奴以沉重打击，他的豪勇、胆略以及使匈奴闻风丧胆的重要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因为如此，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就越能打动人心。

如果说，像魏无忌、李广这样的人物因其自身的悲惨结局，使这些传记所呈现的悲剧形态是外现的、直观的，

那么在另一些传记中，司马迁则把他的悲剧意识潜藏在形象的背后，其悲剧效应不是事件直接冲撞的结果，而是发生在思索和体味之后。这表明，司马迁的悲剧意识没有停留在个别人特殊遭遇之上，他所感受到的人生悲剧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而且，其内容也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君与臣个体之间的矛盾，而更为广泛复杂得多。在《范雎蔡泽列传》中，司马迁写范雎入秦后，以无可阻挡之势步步登上高位，但是，在范雎的事业进入巅峰以后，他的自信心却日益减退。范雎的变化不是因为人们常见的失宠于君王的缘故，相反，文中极力描叙秦王对他一如既往的依赖宠信，尽管如此，范雎仍是“日益以不怿”，甚至在秦王故意用言语激励他振作起来时，范雎做出的反应竟是“惧，不知所出”，范雎当年的勇气和智慧荡然无存，前后表现判若两人。在这里，秦王的态度和范雎无法抑制的忧惧构成很有深意的对比，体现了更深沉的悲剧意蕴。范雎死里逃生初入秦国时，他不怕再失却什么，他是强大的；但他一旦感到需要某种保障时，他就会意识到自己还是那样弱小无力，沉重的压力来自既定的对社会角色的认识，这是毋需从君王的脸色中去感觉的。范雎的颓丧表达的是封建士宦普遍存在的精神悲哀，因为不管他们有多么辉煌的现实，他们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深沉的悲剧意味也体现在一些一生顺利的人物中。《陈丞相世家》记叙了陈平“善始善终”的一生，他在用计扶持汉业的同时，也处处设防保护自己，这使他有效地躲过祸患，并在后来诛灭诸吕一事上建功立名。然而，司马迁却在文章结尾处很有深意地追叙陈平的叹息云：“我多

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这反映了陈平的所作所为与他人格追求之间的深刻矛盾，因而，陈平对自己的一生不是感到自得，却流露出苦涩和无奈。但令人困惑的是，如果不施这些阴谋，又何来以后诛诸吕、定宗庙的大功？何能有“以荣名终”的结局？正如司马迁在论赞中云：“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这一人格理想与人生现状之间的冲突，使作品结束在充满迷惘的疑问中。从本质上说这也是由于不能主动掌握人生产生的悲哀，善始善终的人生背后依然是一出悲剧。

司马迁还常常借助作品中人物的说辞，来展示两难的情势，表现出封建吏士选择人生去向的困迫，而千思万虑后作出的选择，其结果往往被现实击得粉碎。它说明，人生的可悲不仅在其结果，还在于那枉然的选择。如李斯这个人，司马迁固然竭力点出他之卷入阴谋是“重爵禄”的私心所致，但同时却以大量文字叙述赵高劝说李斯的全过程。其意思很明白，即赵高这样一个小人之言终于打动李斯，是因为他的话未必没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如赵高所云“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以及对扶苏上台任人情况的设想，不能不说来自封建社会现实的经验。这些详尽的记叙促使人们生出这样的问题：李斯不作如是选择，他的命运一定会好一些吗？

又如在《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不惜笔墨，长篇大论地引述蒯通的说辞，其中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有严密的逻辑推论，铺陈渲染，铿锵有力。这样写固然有衬托韩信信

守忠义之效，但同时也激起人们对韩信的惋惜，因为蒯通的话令人信服地指出了韩信必将遇到的困境。人们不由得要想，如果韩信的观念中毫无传统道德的制约，他的人生结局又会怎么样呢？作品详尽引用说辞，起到了激化人生矛盾的作用，因为无论像李斯那样充满私欲的选择，还是像韩信那样持守人格的决定，其实都不意味着对人生的主动把握，作品中原有的悲剧意义由此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席勒在论述悲剧的表现时曾指出：“如果说悲剧的目的是激起同情的激情，形式是赖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那么对动人的行动的摹仿，必须包含最强烈地激起同情的激情的全部条件，即最有利于激起同情的激情的形式。”（《论悲剧艺术》）司马迁正是为了充分传示他关于人生的悲剧意识，以唤起世人的共鸣，在他的人物传记中采用了各种表现形式，使《史记》成为一部充满激情的作品。

第三，司马迁叙写人物，很注意通过细节刻画表现人的感情形态和心理变化。尽管《史记》中的大部分人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记述他们的历史作用是主要任务，但他们同时也是具备七情六欲的普通人，那些历史性举动的产生，许多都是凡俗的情欲和动机发生作用的结果。正因为司马迁没有忽略后者，所以《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不仅具有遥远庄重的历史感，而且显出真切生动的现实感。这一表现方式的出现，与司马迁始终站在现实的角度来探究历史有很大关系。前文已经论及，他写一朝盛衰及个人成败，是为了作为现实的借鉴，而不是把历史神秘化，他在《六国年表》中云：“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